

锷是北大化学系的教授，1955年我从东川矿务局出差到北京，在天安门广场同他见面，他好像不太得志。他说他成了苏联专家的陪衬（原话不一定如此），苏联专家比较主观，学术体系又同欧美有差异，教学有不少困难。他从来胆小怕事，我也找不出话来安慰他。不料11年后，“文革”开始，北大学生造反，他是第一批受冲击的，罪名就是当过美军翻译。他不知所措，当天晚上就投进未名湖自尽了。更有甚者，第二天，他同样胆小怕事的夫人也踏着他的足迹走上同样的不归路，丢下两个幼小的女儿流落在北大。1979年我在北京时，刚好张信达也在北京，我们一同到北大寻访这两个可怜的孩子。还好，姐姐已经被安排到化学系的实验室工作，妹妹则安排上了学。我们同她们见了面，竟找不到话语来安慰她们，张信达还对付了几

句，便一同告别回来了。这也是我俩的最后一次会面。

张信达的晚景还不错。1979年那次南行，他从北京继续南下，见到不少当年的老战友。其中有的已经是省一级的领导，受到他们很好的款待。他在东北的夫人先他去世，他又同过去在上海的一位战友结成了晚年伴侣，我曾写诗表示祝贺。从此他有了东北和上海两个家，享受愉快的晚年，直到去世。

“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”。行年90，我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亲友，该有多少祭日值得纪念啊！而具体的，我又记不起来几个。上面所写三位，我就一个也不知道他们的忌日。但同他们的友谊构成我联大生活的重要部分，是我一直历历在目的。谨记如上，以供所有健在的学友参考。

2011年9月17日

他为地质事业奉献一生

——追忆曹添

○谭钰贞（1952地学）

曹添，1926年生于江苏南通石港，这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。他的父亲教过书，办过报（最早的《南通时报》）也办过慈幼院。曹添自小受父亲教导，加之聪颖好学，因此从小便是拔尖的好学生。1935年曾被评为模范家庭中的模范儿童。

1938年日寇侵略到石港，疯狂烧杀抢掠把他家一把大火烧光。他父亲正患病，气愤之下病重而亡。在家破人亡极端痛苦

的情况下，12岁的曹添和家人掩埋了父亲，和母亲一起来到了上海。当时他大姐已从上海美专毕业，在印染厂搞美术设计工作。由于家庭环境的巨变，他母亲病倒了，他也由于过度劳累而吐了血，因此休学。一年后再考入上海中学，他很珍惜这段学习时间。在上中六年学习中，他对文理科都有广泛兴趣，高中分文理科时他想到科学救国，因此选到理科，但他对文科

□ 师友情



1950年7月20日，清华大学地学系地学专业1950届毕业生纪念。前右1为曹添学长

兴趣也很浓，所以报考大学时，他报了六七个学校的不同专业，令人高兴的是全部考取，最后他选择上了清华。

1946年秋，他来到文化古都北平，到了清华园更令他大开眼界。民主自由的气氛环境中，知识渊博的教师和热情洋溢的学生，处处散发着蓬勃的生气。热烈的迎新活动后，民主竞选产生了学生自治会。不久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引起清华同学极大愤怒。曹添这个满腔热血的青年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抗议示威、罢课游行。他能写能画，写了好多标语口号并画了好多讽刺漫画贴在大饭厅。搞运动同时，他清醒地认识到不能耽误学业，因此和同班另一地下盟员互相帮助，更加倍努力地学习。他在地下党领导下担任系级学习委员，经常活动于同学和老师间。他曾在一位地下党员教师家中一起研究保护校产的计划，以迎接解放。

1949年除夕，地学系的师生以汗水和喜悦迎接这有意义的夜晚。在有着“新中国”三个大字的大蛋糕前，大家扭秧歌，唱呀跳呀，高呼“新中国万岁！共产党万

岁！”等口号，人人热血沸腾，不少人流出激动的眼泪，此情此景他终生难忘。

1949年11月他入了党，更明确了他的任务，不仅自己学好而且要带领全班同学学好。他身为班长带头学好功课，并积极帮助吃力的同学，使全班学习都达标。为此他常牺牲自己休息时间为同学辅导。1950年毕业时，他们聆听了周总理讲话“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改造到老”，这成为他

一生奉行的准则。填写毕业志愿时，他三个志愿全填写的是去新疆，因为他觉得大西北是待开发的处女地，需要地质人员去工作。但由于工作需要他被留校任教，他也愉快地服从分配，在新成立的地质系做一名助教。他走上课堂首先自我介绍“我叫曹添”，说着扬头上望“朝天”，同学们便哈哈大笑起来，轻松地听他讲解每一块矿物标本。虽然矿物本身很枯燥，但经他一讲变得活生生起来，因此不少同学喜欢上他的课。同学们毕业后聚会还经常邀他出席，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谈。

转正后，组织上交给他的新任务就是清华职工支部工作。这个支部人数不多，但职责范围涵盖清华园方方面面，如总务、教务、机关、图书馆、工厂、小学、家属等等。他没有经验但虚心学习，支部工作有声有色。当时正值“三反”“五反”，他工作头绪多、担子重，但年轻精力充沛，工作能力和组织领导水平得到很大提高。

1951年6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课后四点半，我们在工字厅举行了简朴而隆重



曹添、谭钰贞结婚照



1951年6月9日，曹添、谭钰贞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小礼堂举行婚礼

的结婚典礼，除一些亲友外，地质系几乎全部师生都参加了。由冯景兰老师填词用抗美援朝的曲子，大家一齐唱起欢庆的歌，场面极为热烈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婚后不久他便出野外实习，我去参加土改。

在清华这个时期也正是国家翻天覆地大变化的阶段，他由一个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，经过党的教育培养，政治上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，业务上也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1952年初，高校院系大调整，以北大清华两校地质系为基础，集中全国地质教育方面人才准备建立地质学院。当时清华大学党委指派曹添参加筹备组工作，和

北大派来的马杏垣教授及市委派来的陈子谷同志三人组成筹备组。任务要求在1952年暑假后一个新型的高等地质学院要建成上课。任务重，时间紧，三人小组分工，陈子谷负责基建总体规划，马杏垣负责教学，而他则负责人事。他一个20多岁的年轻助教，一般党员，资历经验均不足，但他凭着旺盛的精力和不畏困难敢挑重担的开创精神，勇敢地承担起此任务。当时我被分配到人大，单位已分给我们一间住房，在东城船板胡同，离他们筹备组（沙滩）不远。可他决定要住在清华，每天骑车从城外赶到沙滩来上班，因为他认为他是代表清华大学来参加筹备组的，所以应该随时和清华的师生取得联系。他每天骑自行车经海淀过西直门到沙滩，然后再从沙滩或去市委或去计委开会或商讨工作，借一位清华教师的自行车也给跑丢了，可他忙得根本没时间去找。我常常看到他气喘吁吁汗流浹背的样子，他是在拼命地工作。

因为教学需要，不仅要有一定数量的教师，而且一定要保证教师的质量。他求贤若渴到各有关院校联系要人。母校清华给了他极大的支持，有不少基础课教师都是来自清华，可缺口还是很大，他常常为了争取一个教师而反复跑多少次。如测量教师周卡就是例子（周留美回国不久，工作还没定），好几个院校想要他，曹添知道此情况，也积极参加争取，大家一起摆情况，谈理由，最后由市委决定，把周卡分到了地质学院。另一部分师资来源是1952届北大和清华地质系毕业生。他们一般都是学习好的，所以留下后很快成为建校骨干。职工则全部由北工（端王府夹道

□ 师友情

北大工学院原来的职工)转到地院,对这些人的情况他也进行了了解。总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,由不到百人的基础地质人员迅速扩充到四五百人,由单纯教学组织变成全面高等教学单位。筹备组人员默默地付出艰苦的劳动。他们安排好1952年暑期开学后每个人的任务职责,保证教学秩序正常运行,为建立地质学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北京地质学院正式成立后,他被分到矿物教研室,同时兼任教务科副科长及教研室党支部书记。头绪多任务重,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矿物是地质类基础课,开学马上就有教学任务,所以他经常是日夜兼程,白天要将全院教学安排具体落实到各教学环节,要听课、上课;晚间突击俄文(三个月),以后就不断有人来谈工作、谈思想、党团活动等等,工作生活紧张而愉快。

教研室前后来了三个苏联专家,他带领教研室同志向专家学习,因此他曾在全市高校教师学习苏联大会上作典型发言,并协助苏联专家指导两名研究生。

他对老专家非常尊重,王炳章教授年老体弱,他陪着去上课并帮助在旁写黑板,并积极支持王老写出古矿物学讲义。陈光远副教授为教研室主任,陈添主动协助他工作,常在一起坦率交换意见,并积极帮助陈从思想上入党。对青年教师他更是关怀备至,他了解彭志忠对矿物既感兴趣又肯钻研,就支持他去搞科研,为他配备了助手,还送他出去进修;在彭有了发明创造时,他给予热情鼓励和宣传,彭曾说“曹添是我的引路人”。

1953年又一批新生入学,因校址不

够,只好暂时在河北宣化上课。学校指派他去宣化搞教务并担任普通地质学授课。一年后,教学秩序稳定下来,新的实习项目又要开始,领导又指派他任生产实习科科长。这份工作很繁琐,先要和各生产部门打交道,讲清教学目的、要求,还要各职能部门一起配合。规章制度、合同等相关手续都花费了他很多精力和时间。

建国初期由于战略的需要,1958年初领导要他筹备组建三系(放射性地质专业)。这是极端机密又高度污染的工作,许多人害怕,而他认为这是组织的信任也是地质工作者的神圣职责。他接受任务后就全力以赴,到二机部、地质部各部门了解要求,制定教学计划,组织人员建立物探和地质两个教研室,编写教材并积极在极大危险的情况下建立了两个实验室。从高年级中抽出部分学生转入三系,这样一个完整的专业就建立起来了。在这段时期,他经常奔走往来于二机部及地质部,协商学生教学、生产实习等问题。他打了多少份报告已记不清,但他辛苦劳累往来奔波的情景仍留在人们印象中。三系建好后他又回到了矿物教研室。

1960年初,校领导决定命他组建地球化学这个新专业。当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,开创一个新专业困难很多,但他为地球化学发展的前景所鼓舞。他反复思考,走访专家,查找苏联、英、美等国外文献资料,考虑办专业的方向。另一方面,他积极招募人员,除矿物教研室抽出两人为骨干外,又从1960、1961届毕业班同学中抽出一些留校工作,这样一个年轻的教研室就成立了。他经常废寝忘食,白天上课、开会、联系各项事物;晚上编教材,

这样边学习边建设。他鼓舞大家教学相长，并创造了一门课由几个老师轮流讲的“拼盘”式教学法。他热心帮助年轻人走上教学一线，说“我来保驾”，扶他们上马还要送上一程。

1975年学校迁到武汉，他是第一批带地质系师生迁到武汉的。初到武汉时，工作头绪很多，许多领导还都没去，他吃饭时常常是围了好多人来谈工作，没有黑板、灯泡不亮、炊事员和学生吵架等等，他都要细致地做工作。他的宿舍是学生常去的地方，有的同学为他打水，有的为他收拾屋子，他对学生们也不仅是在课堂上传道授业，更多的是从各方面言传身教。学生毕业分配常有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的，这时他会帮助同学向各方面求援，每年毕业分配工作也花费他不少心血。

1969年，我们全家下放江西干校。开始种菜时，他挑粪走不稳粪汤洒了一身，可他不嫌脏不怕累，经过一段时间锻炼行走自如了。当我因病去上海治疗时，同事要我带些日用品，而他只是要我买些蔬菜



1981年校庆70周年，曹添（后右1）与同学返校合影，前左1为作者谭钰贞

种子和种蔬菜的书，因为他想让干校的同志们吃到一年四季生产的蔬菜。干校结束返京后，许多人无事可做，他却主动和生产部门联系举办了多期地球化学短期班，效果很好。

长期的超负荷工作，高血压心脏病严重威胁着他的身体。1980年调回北京后，本应治疗和休养，可他毫不在意自己的身体，一心想将“文革”耽误的时光尽快弥补过来，所以还是急匆匆地扑到工作上。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，他先后招了四名研究生、两名出国代培研究生。为了培养合格研究生，他带病到处奔波，联系实习地点，确定专题，为出国生联系专业导师等等。他的血压常常在200mmHg左右，可他仍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进行着拼搏。

1982年8月，他从内蒙野外队回来，评审稿件、推荐提职称等许多工作等待处理，他都认真完成。10月中，地质学会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学术会议在昆明召开，他作为委员会副主任，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总结报告，这次的大会发言也成为他最后的告别留言。

研究生答辩工作，学校规定11月要全部进行完。他从昆明回来后已经10月下旬，因此他每天关在小房间内审稿、写评语、提建议，连续工作了几个日夜。11月7日，正是全校欢庆建校30周年纪念的日子，校领导全去武汉开会，第二天早上便是他第一个评审研究生答辩会。当他离开书桌准备吃晚饭时，突然因剧烈头疼而晕倒，送去医院后没几天他就匆忙地离开了我们，他是因脑

□ 师友情

溢血而走的。

他去世的消息传开，在地质学院和地质界震动都不小。地矿部领导夏国治很快就来家探望，地质学院的领导、老师也纷纷来劝慰我。去武汉开会的同志陆续赶来，有的买不上坐票是在火车站回来的。老院长高元贵只是连声说“可惜，可惜……”清华大学党委，艾知生、解沛基等送来了花圈；原职工支部的老同志，陈舜琴、邢家鲤、刘颖达、徐凌等参加了追

悼会，我们深为感动。

时光荏苒，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了。大家在欢庆中，想到了建校初期的开拓者曹添，地球化学教研室的同志们回忆起这块坚实的铺路石，而我们全家更为怀念他没有留下一句话，才56岁就匆匆走了。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，但他的精神、人品，他鞠躬尽瘁的赤子之心是泯灭不掉的，我们将永远怀念他。

怀念邱焘

○刘尔翼（1952机械）

今年是我们清华1952届毕业60周年，同学们将在北京聚会。以前每次聚会邱焘都来参加，可是今年我再也见不到邱焘的

身影了，心中感到十分郁闷和失落。

邱焘是我的好友，我与他不仅是清华的同班同学，早在解放前的1946年，



2009年4月19日全班返校聚会，邱焘（前排右3）带病参与同学们合影

我们就是北京师大附中高中一年级的同班同学。他每次到北京来我们都约会见面，或与往日的同学相聚畅谈和交流。在同学们眼中，他好像文质彬彬，俨然一名文弱书生，实际上绝非如此。他不仅才华出众、聪明过人，而且是一位品德高尚、有组织才能的人。他在师大附中的班上很有威信，高三时就被推